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德) Harald Kittel 编
Armin Paul Frank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德) Harald Kittel 编
Armin Paul Frank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7-0456

© Erich Schmidt Verlag, Berlin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德国 Erich Schmidt Verlag 图书出版公司独家授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上述图书的权力。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 =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 (德) 基特尔 (Kittel, H.), (德) 富兰克 (Frank, A. P.) 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跨… II. ①基… ②富… III. 文学—翻译—研究—英文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9815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西方翻译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走向学科化以来,这一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者们借鉴了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各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派别。如果说西方翻译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话,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哲学、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等则从各种不同角度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近20年来,尽管翻译研究的范式纷呈不一,且有不少学者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依然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但这一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转向”,有很多学者从关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转为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涉及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哈罗德·基特尔与阿明·弗兰克主编的《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就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或许是因为文化转向首先发生在文学研究领域,且社会文化因素在文学领域较为突出的缘故,翻译的历史描述研究往往聚焦于文学文本(也较为关注宗教文本),与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形成对照。本论文集的11位作者中,有10位是德国哥廷根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者;两位主编也为该中心的学者,是年富力强的博士(第一主编)和资深教授(第二主编)的互补搭配。本书是集体合作研究的成果,涉及文学翻译之历史描述的不同方面,探讨了以往被忽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一篇之外,书中的论文都在1988年6月于英国沃里克大学举行的“超越翻译”研讨会上宣读过。研讨会的主席就是文化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苏珊·巴斯内特教授。所谓“超越翻译”就是不局限于对译作和原作之对应关系的关注,注重考察影响制约原著选择、翻译过程和译本接受(包括其在目标文化中的建构作用)的各种外部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文化转向开始走向高潮的时期,这个研讨会和作为其部分成果的本书就是这一研究潮流的一个体现。

定位与特色

“文化转向”扭转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对文化因素的忽略,开拓了翻

译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这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然而正如西方文论界各派之间存在明显的排他性一样,在翻译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唯我独尊的排他现象。不少文化学派的学者趋向走极端,夸大该学派自身的作用,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展开翻译研究才是正确的。有的文化学派的学者只是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范畴或一种佐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学派还呈现出越来越激进的倾向。有的学者只是把翻译视为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一种工具,从学术研究转向政治斗争。有的学者受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怀疑、叛逆、颠覆之倾向的影响较深,反对翻译的理性研究,从另一角度对关注译作和原作之对应关系的翻译本体研究造成了冲击。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翻译的文化转向在国内外均遇到了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要回归语言研究,或用语用学等其他范式来加以取代。这里有3点值得注意:1.正如单一语言文化中的语言学、语用学、文化研究等等无法相互取代一样,跨语言文化交际中的各种研究学派(以及每一学派的不同分支)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重点和盲点、立场和原则、长处和局限性,互相之间应作为一种共存互补的关系。即便就理性研究与反理性研究,或注重译者的忠实性(以原作为中心)与注重译者的再创造性(以译作本身为中心)而言,也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互为对照的视角,两种方法的共存也是不无裨益的。毋庸置疑,因为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交流,也是跨文化的交流,因此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角度永远是不可或缺的。2.就具体翻译实践而言,有的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较为突出,有的语言转换受到文化差异的严重干扰,有的审美特征的传递构成一个重点,有的语用关系特别值得关注,有的凸显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制约,有的特别值得探讨译作是否做到了与原作对应,有的则更值得关注译作本身的实用目的或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建构作用,如此等等。此外,就具体翻译研究者而言,同一学者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还需要对各种方法加以综合利用,以便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从这一点来说,掌握翻译的“文化”研究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3.就文化学派的不同分支而言,各有各的特点和用处。的确,若仅仅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场域或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翻译学科本身的建设不会有多少作用,但仍然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来看清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如何(或可以如何)通过翻译实践来运作。

本书属于文化学派中较为温和的一类。有以下几个特点:1.依然是基于理性的研究。2.总体而言,不是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范畴,而是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3.书中的一些论文依然关注译作和原作的对应关系,描述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上的不对应和如何在翻译中采取适当措施来取得对应的效果。此外,本书中的一些论文还以原作的文化指涉为标准,描写译者的文化偏离或文化误读。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在挑战翻译的“文

化转向”时，认为关注文化因素必然导致对具体语言问题的忽略。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差异往往通过语言来承载和体现，因此翻译的文化研究依然可以关注语言的转换，只是需将注意力从语言形式本身转到语言的文化指称和文化意义上来。后者的转换往往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如何较好地完成翻译中的“文化转换”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也是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4. 本书中的一些论文注重对文化转换普遍规律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加以描述的模式。由于这些特点，本书十分契合国内翻译界目前对回归理性研究和本体研究的呼唤，可以为我国译学范畴的文化研究和教学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基本内容

本书由4部分组成，前3部分构成本书主体。总体而言，第一部分较为关注翻译的外部因素；第二部分则在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达到了一定平衡；第三部分的第一篇与第二部分较为相似，也体现了“内部”与“外部”的有机结合，其余两篇则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本书描写性研究的主要轨道，转向了翻译的理论研究。第一部分共有3篇论文，集中探讨在18世纪的德国，将英语作品通过法语中介“转译”成德语作品的翻译实践。3篇论文构成了一种连贯而互补的进程：从虚构作品到非虚构作品，然后到一个个案研究。第一篇根据法国语言文化对译文影响之大小和德国译者对于法国的不同态度，将间接翻译英国小说的译者分为4类，并对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此揭示出18世纪德国翻译文化的复杂性。第二篇通过实例论证指出：虽然以法语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在1770年左右就已销声匿迹，但在非虚构性文本之范畴，这种间接翻译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该文仔细考察了造成这两者不同步的文类规约和历史文化原因。第三篇论文集中探讨以法语为中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的德译。该文分析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不同译本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及其蕴含意义，并挖掘了造成这些不同特点的意识形态、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动态因素。这一部分对“转译”的探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描写翻译学在研究疆域上的拓展：将一些以往被忽略的边缘翻译种类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美—德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译者的不同处理方式。该部分由4篇论文组成。第一篇集中考察T. S. 艾略特的《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法文和德文译本。《荒原》这首诗具有丰富的语言和文化复杂性。该文对其文本成分的文化意义和互文含义进行了颇有洞见的分析，并通过归纳总结，提出了一个由6种参数构成的模式，用于描写原文中的文化指涉和译者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处理。这6种参数分别为：1. 文化指涉的明晰度（从最为微妙的文化内涵到明确无疑的文化上的陈词滥调）；2. 范围（或特属于某个

地区、某个阶级，或属于某个国家，或具有文化普遍性）；3. 性质（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等等）；4. 历史维度（文化指涉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5. 语篇类型；6. 一体性或者融合性（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指涉与作品融为一体）。这6种参数为描写分析不同译者对《荒原》中文化指涉的不同译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但该文指出，对其他作品的译文或者其他文学/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进行研究时，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参数或者删减既定参数。此外，在一个情景语境中显得十分重要的参数，在另一个情景语境中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同样，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源语中最为平淡无奇的文化指涉有可能会在目的语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进行描写分析时，该文有意识地避免偏向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力求通过聚焦于转换过程在两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而且综合考虑了语言、文学、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第二篇论文探讨了9位德国译者在翻译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时，对于物质文化词语的不同译法。该文认为，这种分析可以达到3个“特殊的”（distinctive）目的。其一，就同一原文而言，可以揭示不同译文的相互关系；其二，可以揭示出译者对于原作品、原作者和翻译艺术的看法。应该说，这两个目的是文学翻译研究所共有的，而不是文化词语译法研究所特有的。只有第三个目的才真正具有特殊性，即揭示同一文本的先后译者对于原文中社会与自然背景的不同熟悉程度。该文不仅关注两种语言的文化词语在指称意义和内涵意义上的不一致，而且注重探讨译者由于不熟悉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而偏离原文的各种现象，还分析探讨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第三篇论文将研究焦点对准政治文化，探讨了德国译者在政治审查制度的作用下，对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所进行的各种更改。该文证明在这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为“通过译作与原作的比较，我们可以比仅仅研究原作更为准确地估量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这篇论文属于文化学派的一个分支——“操控学派”的范畴，该分支聚焦于目的语文化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等）对翻译过程的制约。第四篇论文探讨德国译者在翻译马克·吐温的《田纳西州的新闻业》时对美式幽默的处理方式。鉴于德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在对于幽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译者有意识地进行各种改动，并增加了一些原文没有的成分，以求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类似的幽默效果。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从文化的角度描述了如何争取获得“同等反应”，或达到“动态对等”。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分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注重对描写模式的建构或对普遍规律的挖掘。作者只是将具体文本当成说明描写模式或普遍问题的实例。

第三部分由3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探讨戏剧翻译中人物名字和头衔的译法及其文化含义。该文采用历史描写的方法，对3个世纪以来法语—波兰语和波兰语—德语/英语的戏剧翻译进行了系统研究。就人物名字而言，

主要有以下5种译法：1. 照搬不译；2. 根据译入语的拼写和发音规则来同化原名；3. 用译入语的对应名字来替代原名；4. 仅翻译原名的意思（语义翻译）；5. 仅传递原名所用的某种艺术手段（以反映出人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至于人物头衔，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 省略；2. 添加；3. 照搬；4. 更改；5. 语义翻译；6. 替代。如该文所示，人物名字和头衔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示，在翻译中常常会导致两种历史语境、两种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冲突，面临这些冲突的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加以处理。该部分后两篇论文将注意力转向了“可译性”这一理论问题。一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苏醒》（又译《为芬尼根守灵》）的可译性。该文认为“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学文本和语言的根本看法。从传递意义的角度来说，像《芬尼根的苏醒》这样以语言嬉戏和意义含混为特征的作品是不可译的。既然意义在原文中难以确定，一个特定的译本就“只是可能的变体之一”。该文借鉴古德曼对于“亲笔书写”（autographic）的艺术与“代理书写”（allographic）的艺术的区分，分析了这样的原文与其各种“变体”之间的关系。然而，古德曼的符号理论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的文学文本，该文对古德曼的借鉴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模糊了《芬尼根的苏醒》这种意义含混的作品与意义较为清晰的作品之间的界限。另一篇探讨可译性的论文比较了美国哲学家奎因、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和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不尽相同的立场，指出对语言本身的看法决定了对可译性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反过来看，对翻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为对语言的根本看法提供了支持。虽然探讨的对象是一些非传统或反传统的理论，但该文自身所持的立场依然是传统的、理性的，旨在探索科学规律。

本书第四部分仅有一篇论文，题为《寻求文学世界地图》，出自若泽·朗贝尔教授之手。他任职于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该文是他在德国访问讲学时的一篇演讲稿。尽管朗贝尔是描述翻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该文关注的是如何对文学本身进行较为客观科学的划分和描写，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一个社会文化区域中存在何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是在什么区域生产和接受的；文学现象之间是什么关系；存在什么文学规约或规约系统等。朗贝尔挑战了“国别文学”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没有顾及国别内部的文学差异，未能涵盖被边缘化的文学和外来文学，也难以解释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国际化的倾向。他提出存在划分文学的很多可能的方法，但对不同文学进行划分和解释时应综合考虑国别、语言、政治、规约、经济、宗教等多种因素，还应对历时变化加以关注。该文的广阔视野和较为平衡的眼光值得借鉴，该文对文学分布的研究也构成文学翻译研究的一种重要背景知识。

总体而言，本书展示了译学研究中历史描写方法的一些主要特点和作

用,揭示了各种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描述了在面对两种语言所体现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时,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不同处理方法。此外,本书还在具体探讨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描写参数或描写模式。描述性翻译研究与规范性翻译研究构成一种明显互补的关系,两者探讨的都是对方难以关注的东西。规范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出翻译规则和翻译标准来改进翻译实践。而通过描述性研究,可对以往的翻译实践达到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依据或参考。此外,正如本书中有的论文所示,描述性研究也可以把原作作为一种(隐含)标准,来描述译作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原作的偏离,从而为避免相关误读、误译提供一种警示,还可描述译者如何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文化差异,在译入语文化中取得类似反应。这种描述本身隐含了规范,与规范性研究形成一种呼应,或为之提供了一种佐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仅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揣测性的回答,不少结论也带有推测性。这反映出历史描述方法难以克服的一种局限性:今天的翻译研究者在探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时,难免会遇上缺乏确切事实或第一手资料的障碍,故只能根据已知情况作出种种推测性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不乏洞见和启迪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中的不少论文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文化关注与语言关注有机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符合目前国内翻译界的迫切需求。相信本书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对我国的翻译教学和研究起积极推进的作用。

申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Preface

All but one of the papers collected in this volume were originally read at the conference "Beyond Translation"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in June 1988. The form of separate but cross-referenced publication was agreed upon with the organizer, Dr. Susan Bassnett, in order to make it easier,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to present to a wider audience the wealth of studies and ideas discussed at Coventry.

The papers originated in the Göttinge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at the Georg August Universität). They represent cooperative research, distinct in kind and scope, and are arranged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ifferent conference sections in which they were originally presented.

The first group—"Indirect Translation"—focusses on a vital, and hitherto neglected, aspect of multicultural transfer: the different and changing roles of French literary mediator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re specifically, the changing role of French intermediate trans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Two studies, concerned with the persistence of French literary models in indirect German translations of fictional and nonfiction prose, respectively, outlin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displayed depending on genre and point in time. The third paper is a case study: Deal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four-way translational recep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it contrasts the phenomenon of indirect translation, as discussed by Graeber and Roche, with th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features—reflecting the changing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s and the volatile ideological climate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displayed by various translations (direct and indirect) of a specific text.

The second subdivision—"Transatlantic Currents"—is introduced by a transitional paper which focusses not on an eminent text in multicultural transfer but on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 on multicultural elements in a ground-breaking poem: T. S. Eliot's *The Waste Land*. Making up the main body of this section, the remaining papers discuss how German translato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sponded to various kinds of element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ultures. Focussing for the most part on striking translational deviations, they cover the range from material culture to political systems to American humor, and suggest plausible explanations. The cases were all taken from the highly integrated work of an American-German study group at the Göttingen Center (whose findings were published, *in extenso*, as volume 3 of *Göttinger Beiträge zur Internationalen Übersetzungsforschung*).

In the third section—"Modalities of Translation"—three papers deal in very different ways with this central aspect of cultural transfer through literary translations. Combining the issue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of cultural transfer, Brigitte Schultze examines the treatment of personal names and titles in drama translations (Polish/German, Polish/English) from a historical as well as a systematic point of view. Sabine Lorenz, on the evidence of James

Joyce's extravagant novel *Finnegans Wake*, suggests that untranslatability not only occurs on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or cultural items; in extreme cases it may be the result of the source text being *meaningless*, in a conventional sense. Her discussion of pos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 *original* text and its translations leads to the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literary texts, generally. Horst Turk approaches the problem of translatability by contrasting the distinct positions taken up on this issue by Benjamin, Quine, and Derrida. His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ions of language and of translation leads, *inter alia*, to the conclusion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s—for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reasons—are a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testing ground for advanced hypotheses.

The volume concludes with a guest contribution by Professor José Lambert (Leuven).

Finally, the authors and editors are indebted to many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for scholarly advice, mor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he editors are especially obliged to the organizers of the Warwick conference "Beyond Translation," to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the Niedersächsische Minist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and the President of this University.

The manuscript of this volume received its present for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arald Bilke, Margaret Kittel, Petra Lepschy, and Elke Zech.

Göttingen, June 1990

Harald Kittel, Armin Paul Frank

Contents

Preface	xv
I. Indirect Transl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ntroduction	3
Wilhelm Graeber: German Translators of English Fiction and Their French Mediators ..	5
Geneviève Roche: The Persistence of French Mediation in Nonfiction Prose	17
Harald Kittel: Vicissitudes of Mediation: The Case of Benjamin Franklin's <i>Autobiography</i>	25
II. Transatlantic Currents	
Introduction	39
Armin Paul Frank and Birgit Bödeker: Trans-culturality and Inter-culturality in French and German Translations of T. S. Eliot's <i>The Waste Land</i>	41
Birgit Bödeker: Terms of Material Culture in Jack London's <i>The Call of the Wild</i> and Its German Translations	64
Erika Hulpke: Cultural Constraints: A Case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71
Birgit Wetzel-Sahm: Dead-Pan Emotionalized: American Humor in a German Translation of Mark Twain's "Journalism in Tennessee"	75
III. Modalities of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89
Brigitte Schultze: Problems of Cultural Transfer and Cultural Identity: Personal Names and Titles in Drama Translation	91
Sabine Lorenz: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Translating <i>Finnegans Wake</i>	111
Horst Turk: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ability: Benjamin, Quine, Derrida	120
IV. Guest Contribution	
José Lambert: In Quest of Literary World Maps	133
SFB Publications since 1988	145

I. Indirect Transl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ntroduction

'Indirectness' is a somewhat unspecific and potentially misleading attribute for a translatorial phenomenon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d in German as 'Übersetzung aus zweiter Hand.' Genetic rather than evaluative, this description is applicable to any translation based on a source (or sources) which is itself a translation into a language other than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or the target language. Occurring time and again in the literatures of many countries, on different continents and in distinct cultures, this phenomenon is presumably as old as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separated, first and foremost, by linguistic, if not by cultural,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barriers. The continuing history of Bible translation has produced particularly notable examples. In the Middle Ages Greek philosophy and science were rediscovered and made available to the learned through Latin translations of intermediate Arabic versions. During the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French translators, in particular, acted a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mediators between their Spanish, Italian, English and German neighbors. German, in turn, served as a linguistic bridge and cultural go-between linking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More recently, English has assumed this role virtually on a global scale. In contemporary Indian, literature written in one of the autochthonous languages is fairly regular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thence into the other indigenous languages. Or, for that matter, there is Ernst Robert Curtius who, in translating T. S. Eliot's *The Waste Land*, consulted the French version by his friend Jean Menasce, and followed it in some places, even into erroneous renderings.

While the persistence of French cultural predomin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is well documented, the mediating role played by French translators of foreign—especially, but by no means exclusively, English—literature, fictional and non-fictional alike, has received s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Blassneck's important dissertation, *Frankreich als Vermittler englisch-französischer Einflüss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1934), opened the field, but remained virtually unnoticed; literary comparatists have noted the phenomenon of indirect translation more or less in passing; student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have emphasized, for instance, its importance for the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original geniu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Von Stackelberg's pioneer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Übersetzungen aus zweiter Hand. Rezeptionsvorgänge in de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vom 14. bis zum 18. Jahrhundert* (1984), cast fresh light on these complex matt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via French (excluding drama) is provided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critical bibliography by Graeber and Roche, *Englische Literatur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Introduction

in französischer Übersetzung und deutscher Weiterübersetzung (1988). The pertinent comments accompanying each entry correct several prevai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Germany during that period. Sponsored by the Göttingen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research within this specific are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fer is in progress, aiming at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distinctions, including gener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es.

The contributions by Graeber, Roche and Kittel to the Warwick conference, printed in this volume, provide summaries of preliminary results of ongoing work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of research.

German Translators of English Fiction and Their French Mediators

In his translator's preface to *Das Theater des Herrn Diderot*,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complains about the French influ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Selten genesen wir eher von der verächtlichen Nachahmung gewisser französischen Muster, als bis der Franzose selbst diese Muster zu verwerfen anfängt. Aber oft auch dann noch nicht¹.

Lessing directs his criticism not so much at the French model itself as at the German dependency on France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imitation of almost every French fashion. To be a Frenchman meant, in Mrs. Gottsched's words, to enjoy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prejudice in favor of this nation². However in 1760, the date of Lessing's remark, the process of Germany's intellectual liberation is in full swing. Germany's discove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upports this process as a catalytic agent; for, as Germans become aware of their kinship with the English, they realiz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dissimilarity with France. Initiating this development is England'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erman way of think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 least according to Paul Hazard who adds that Germany developed its own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only after its intellectual liberation from the French model³.

As a result of the English influence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French hegemony" takes place in Germany⁴. France herself plays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e weaning process, as English authors first become known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in French: The works of Locke and Pope, Defoe and Swift,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are at first translated in Germany as well as in Italy or Spain from earlier French translations. Although in their prefaces French translators brag about the liberties and modifications they venture vis-à-vis their English

¹ LESSING 2:25.

² "[...] ein Franzose seyn, das heißt, den Schutz aller Vorurtheile der Deutschen von der Vortrefflichkeit dieses Volks, genießen [...]" GOTTSCHED, *Popens Lockenraub*. (Preface to her retranslation of Pope's *Rape of the Lock*).

³ "L'effet le plus certain de la pensée anglaise sur la pensée allemande sera de détacher celle-ci des modèles français, trop différents de son essence profonde; de lui fournir des modèles plus voisins, plus familiers; de l'aider à se dégager, jusqu'à ce qu'elle soit arrivée à la forme originale." (HAZARD 69).

⁴ "Au cours du XVIII^e siècle, on verra se manifester, sur la terre allemande, les conséquences de l'avènement de l'Angleterre: la rebellion contre l'hégémonie française." (HAZARD 69).